

融汇中西颂新“神”： 论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

张保华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81)

摘要: 沈从文边城世界的“意识形态”包蕴着传统桃花源“顺应自然”和西方乌托邦“征服自然”的双重因子,其东方式顺应自然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价值对“科学”的阐释,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其启蒙理想又能保持边城世界的牧歌性的新“神”,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价值理性的内蕴。沈从文采撷中西、两相乘除、优化融合而成的“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生存想象,显示了一位立足传统、容纳世界、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家深广的思想视界。这个充满张力的思想视界无论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还是对于现代性发展已经呈现出负面影响而寻求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西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 桃花源; 理想国; 边城世界; 意识形态; 思想视界; 沈从文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177-04

作为人类向存在发问、遥望理想生存的载体,几千年来,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学脉系世代薪尽火传,不断增砖添瓦,构建起了各自具有本民族文化、哲学特色的精神栖居之所。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及其他相关归隐田园的诗文,就是如此——其精神家园的“模式感”如此之强,以至于成为影响后代作家心理精神结构的关于理想生存图景的荣格式“原型”。到了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以小说《边城》及其湘西题材的小说、散文,生动地描摹出了一个天人和諧、抱朴含真的边城世界,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隔千年,遥相呼应。但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交织、中西文化融合的转型时代的沈从文,基于边城世界的民族生存想象显然又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考量和思想视界。

在人类发展史上,各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存想象。在西方,大约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了16世纪以后,相继出现了托马斯·莫尔的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乌托邦》及其他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乌有之乡。这些均可看作以《理想国》为原型的关于理想社会的生存想象。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一书中曾经指出,乌托邦一旦成为实践模式,必然沉积为一种维持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1]。即使没有成为一种实践模式,任何乌托邦理想也都具有维系该系统独立完满地存在的某种“意识形态”。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哲学使相应的理想国度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使“理想国”或者“乌托邦”都建构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强调人在改进人类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拿《理想国》与《桃花源诗并记》相比较,中西民族关于理想生存的思维品质与价值诉求的不同显而易见,虽然都把追求社会和谐作为终极目标,但“理想国”中强调社会等级和分工,各类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从而秩序井然。而划分等级和分工的依据是一个人智慧的高低,因而“理想国”推崇理性,重视教育对人的心灵陶冶和智慧培育作用。“桃花源”则“虽有父子无君臣”^[2],人们委运自然,平等相处,自给自足,各安天命,因而“桃花源”绝圣弃智,所谓“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3]。是运用人智还是顺应自然,反映出中西民族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这种区别反映出各自所宗的“人为自然立法”的人本哲学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本哲学的本源性差别。

收稿日期: 2013-09-20

作者简介: 张保华,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驻马店黄淮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E-mail: baohua1127@163.com

如果说《理想国》的意识形态是理性主导下的“征服自然”,那么统摄桃花源世界的“意识形态”则是“顺应自然”。我们知道,任何乌托邦都是远离现实世界的一个想象国度,但中国的“桃花源”更有自己的特点,即处于一个历史时空封闭的环境中,并赋予这个“封闭”以某种理念的象征意义——“息交绝游”,拒斥、否定外部世界的主流历史文明,从而保证师法自然、安分自足的价值观念及社会理想的实现。陶氏桃花源封闭的地理环境自不必说,“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暗示的与主流历史文明的隔绝,其“不足为外人道也”对外部文明的主动拒绝与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庄子的“行而无迹,事而无传”气息相通,将时空的封闭看作保持自然价值的必要途径。在桃花源这个封闭自足的国度里,人们依据天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据时令植菽采稷,春种秋收。没有君王,不受官府节制,应天而动,顺时安分,从而获得“自然”本性,人性“抱朴守真”。正是在这样一个顺天守时、秩序井然的世界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安然和谐,其乐融融。

二

作为桃花源原型的现代承续,沈从文的“边城世界”具有跟桃花源相似的内在和外在意义结构。“边城”所在地湘西苗区万山环绕,加之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当地的行政管理,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后来“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更形松散”^{[4]22}。长期封闭的环境不仅使这里“言语饮食,迥殊华风”^{[4]14},道德观念、处事方式上更是沿袭了上古风习,这种社会结构和地方风俗的特点甚至到了《边城》故事发生的后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不过,与桃花源“顺应自然”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是,湘西深厚的巫楚文化土壤,又使道家的顺应自然与万物有灵的神灵崇拜相混合,人们敬神守法——神即自然,法乃古习,“一切皆保持一种淳朴,遵从古礼”^{[5]107}。在“边城世界”,人间聚讼皆照习惯法来解决。惟运用这种习惯规矩排调一切的,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颇有部落时代的遗风。这里没有同时代别的地方等级森严的官吏行政制度,负责地方治安的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因与地方和谐相处,平时几乎不为人意识到其存在(小说中端午节放鸭子等场面的描写极力渲染着军民

同乐的和谐关系),因而政府式的行政管理在这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社会秩序的运行依据的是自古形成的习惯。在尚古的民族思维传统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对“上古之世”都极为推崇,而“上古之世”人们的行为准则是准乎自然的,遵循古习也往往就意味着顺应自然。

这个以顺应自然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桃花源,其人性与生命具有与外部世界迥异的特征,即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社会地位上的尊卑高下,皆顺应自然而生成,众生平等。“边城世界”中顺顺虽为船总,但从不骄纵于人,待人和善,慷慨大方,水面得来的钱财还在水面上散去,去留无意。翠翠在山野间长养而成,如同黄麂,无机心,无忧虑,自由自在。由顺应自然而万物齐一,由万物齐一而生命平等,由生命平等而仁民爱物,“边城世界”人性的古朴仁爱所来有自。

在人事上顺应自然以外,沈从文还描写了“边城世界”人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图景:“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边城的屋舍临山滨水,因地制宜,与周围地势相得益彰,这种建筑原则及艺术也同样是拜顺应自然所赐而得之,而这种“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之美,同样会产生美好的德性,因为“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6]107}。

“边城世界”在“师法自然”、“顺应自然”主导价值观念的规约下,人性呈现出如道家所追求的全真保性、见素抱朴等美好的一面,沈从文将之与来自民间文化熏陶的原始、雄强的生命力结合到一起,展开了“边城”文本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多重批判,如贪欲之下的人性自私堕落,文明禁律束缚下的生命力萎缩等等,并由此思索以“美与爱”为核心的民族品德重造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沈从文并非对传统道家的“顺应自然”无保留的接受,他的自然观实际上更接近于卢梭的“回归自然”,即被文明扭曲的人性向“优美、健康、自然”的天性的回归。沈从文是向前看的,他的目的非常明确,“我立意不在于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借……为人类的‘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7]。这里,“桃源”是具有双关的含意的,既实指桃源县,也虚指桃花源。

三

沈从文不是要引领读者回到陶渊明的“桃花源”,那个正直文人趋遁的“理想国”或风雅文人艳羡的“温柔乡”,均在志在改造国民品性、建设“爱”的国度的沈从文的视野之外。也就是说,“边城”虽然是

沈从文批判人性日益堕落衰败的都市文明的对立性坐标和缓解心灵压力的灵魂栖居所,但决不是其构建理想社会的目标。个中主因就是对作为桃花源式社会主导意识形态“顺应自然”的不满与反思。

沈从文有一篇散文《桃源与沅州》,首先消解了人们关于桃源世界的梦幻式想象。这篇游记描写了桃源县的历史风习与边民的生存现状,这里既有古已有之的“合法”的卖淫,也有使用新式汽车运输的“违法”的鸦片,还有不久前发生的针对农民暴动的杀戮,在对种种腐败批判中,隐含着作者对边民“生命观”的隐忧:遵循亘古不变的生活习惯的麻木的生死,生命的轻贱,如妓女染病仍然接客,病重死亡时“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小水手不小心淹死了,掌舵的只需把衣物交与其父母,“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当地农民在大学生的率领下请愿遭到的镇压,死了四十几个人,“几年来本地人派捐拉夫,在应付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事也慢慢的忘掉了”。几个无意识运用的表示“完成”、“过去”时态的“了”字,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鲁迅、萧红笔下的国民生态状貌——盲目生死,麻木健忘,终日发生着“几乎无事的悲剧”。

沈从文也并非只是守常不变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含泪的笑”之下“求变”的渴望同样强烈,就表达着作者改变顺应自然的民族思维习惯的欲求。比如老船夫的女儿死后,小说这样写他的内心苦楚“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事实上后来老船夫在对待翠翠的婚事上的主动态度与对其女儿时的顺其自然已经有所不同。沈从文对这个令人惆怅的悲剧故事的成因的思索同样充满了“变”的动机,“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6]121}“顺应自然”的结局并非都是“天随人愿”,如故事中所写一样,“到处是不凑巧”。当人们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不具有沈从文常说的“支配自然”的意愿与能力时,即使是“充满了善”的动机,结果同样是令人伤感的。

在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中,作者更是直接表达了变顺应自然为征服自然的天人观。也就是说,沈从文提出了扬弃、改造民族性格、思维的主张。沈从文对囿于一隅的边城人,一面极力肯定他们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不畏贫贱艰难的忠实庄严的生活态度《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生命如无生命的物质一样自然放射分解却“对历史毫无担负”而“忧郁”。“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担负,活在这无人知

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的习惯,同样也那么尽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分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我们用什麼方法,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一种‘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种新的竞争方面去?”^[8]

这是一段具有沈从文特色的言说方式,但却有着“五四”启蒙作家探求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理路。可见,“五四”一代对道家(包括道教)的批判显然给予了沈从文潜在的影响。特别是与沈从文有着师承关系的周作人在《乡村与道教思想》中所说的“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9]等,给予沈从文思考民族品德重造和民族生存发展出路时以思想资源。

那么如何改变这些人蒙蔽的生存状态呢?沈从文的答案是,“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强调理性,生成主体意志,并用“意志”代替“命运”,希望“边城人”由“对历史毫无担负”到主动地参与历史,从“与自然妥协”(顺应自然)到能够“支配自然”。很明显,一向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与“五四”作家不大相同的沈从文在发明人的主体精神这一点上,回归了“五四”的轨道。在肯定传统的自然人性的基础上,融化、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提出了主要针对“边城人”的“新道家思想”,即发扬自然、健康、优美的人性特质的同时,又能够以积极的主体人格参与历史,创造历史。

四

沈从文在传统国民性中注入了“意志”、“理性”这些现代品格,希望中国民族能够运用“科学”,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与他族竞争生存,共赴“世界大同”。很显然,这个充满开放性特点的大同社会已与封闭的桃花源大不相同,其意识形态也由“顺应自然”转变为以“科学”、“理性”等西方现代价值为工具的“征服自然”。这里,沈从文“借以看民族品德的重建该从何处入手”的“边城世界”已与前述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了超越时空的精神链接。

那么,边城世界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是不是出现了精神“断裂”?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正是沈从文“民族品德重建”的独特之处。在普遍的追慕西方的“科学”等现代价值的主流声音中,

沈从文对于传统既不妄自菲薄,对西学也不盲目地随波逐流,真正做到了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0]。他将传统思想中的精华与现代价值观融会贯通,“别立新宗”——寻找承自农耕文明的自然之“神”与引自西方工业文明的“科学”在人类精神价值向度上的契合点,从而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生存寻求继往开来的路标:

在科学还没有使人人能相信自己以前,仍然尽他们为神所管束,到科学发达够支配一切人的灵魂时候,神慢慢的隐藏消灭,这一切都不须我们担心。但神在××人感情上占的地位,除了他支配自然以外,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正直和诚实和爱:科学第一件事就是真,这就是从神性中抽出的遗产,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抛弃正直和爱,所以我这里的神又是永远存在不会消灭的^[5]¹²⁴。

所谓的“神”,并不是迷信,而是“正直和诚实和爱”,亦即沈从文一贯称颂的“人性”及其极致“神性”的抽象表达,这种神性价值与科学不仅不矛盾,还有内在的统一性。因为“科学”的本质是“真”,“真”是“从神性中抽出的遗产”,因而“科学如何发达也不会抛弃正直和爱”,这是作者从他一贯的道德视角来看待“科学”的伦理价值的。将“科学”道德化,在沈从文并不难理解,一般说,科学求真,艺术求美,道德求善,似乎各司其职,互不关涉,沈从文却常常从自然之美中体悟到“善”,并认定“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既然如此,那么将“科学”的“真”视为“善的一种形式”也是顺理成章的。这里,我们看到,沈从文有意识地从道德视角将“神”与“科学”联系起来,突出二者精神价值的共通性、延续性,希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将来自于自然的这些“神性”薪火相传下去,

这个思想非常耐人寻味,这是不是沈从文在进行启蒙时,为预防西方式的工具理性膨胀导致道德堕落而做的未雨绸缪?

我们知道,工具理性的膨胀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背景,归根结底与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哲学有关,在这种哲学观念下,人是万物的主宰,自然是可以用来任意支配、掠夺的对象,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这种本来旨在解放人类的理性变成了束缚自我和统治自然的异己物。在沈从文时代的中国,虽然工业文明还不很发达,但是现代物质文明尤其是商业文明对人的道德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沈从文批评“海派”的文章中,常常感叹“‘现代’已经到了湘西”,“唯实唯利的人生观”日渐占据原本淳朴的乡下人灵魂。与工具理性相反,价值理性视外部世界为与人和谐合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表征人的存在意义、体现终极关怀的心灵归宿之所。毋庸多说,这种理念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相通的。沈从文虽然没有如马克斯·韦伯那样对理性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11],但他以文学的形式将“科学”与“现代”做了区分,二者的内涵与分野与韦伯关于两种理性的阐释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东方式顺应自然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价值对“科学”的阐释,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既能实现他的启蒙理想,又能保持边城世界的牧歌性的新“神”,也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价值理性的内蕴。沈从文采撷中西、两相乘除、优化融合而成的“向人类远景凝眸”的生存想象,显示了一位立足传统、容纳世界、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家的深广思想视界。这个充满张力的思想视界无论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还是对于现代性发展已经呈现出负面影响而寻求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西方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6.
- [2] 刘乃昌, 高洪奎. 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 46.
- [3] 陶渊明. 陶渊明集校笺[M]. 龚斌,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403.
- [4] 凌宇. 沈从文传[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 [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7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107.
- [6]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2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 [7] 刘洪涛, 杨瑞仁. 沈从文研究资料: 上册[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53.
- [8]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第11卷[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281.
- [9] 周作人. 周作人自编文集: 第2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89.
- [10]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7.
- [11]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M]. 阎克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15.

(责任编辑 王 平)